

西班牙人占領以前漢人移居基隆和平島的歷史進程與性質**

黃麗生*

論文摘要

和平島位於今基隆港的東北方，古稱「小琉球」，自宋元以降就是從福建向北到琉球、日本，向南到呂宋，以及由呂宋到日本的航線地標；並於 16 世紀逐漸以國際轉口貿易中心的海港面貌聞世並名為「雞籠」，在東亞海洋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距今 4500-3500 年前以降，島上就有新石器文化人類聚落；現存最早定居島上的原住民是凱達格蘭族巴賽人 (Basai)，其祖先於二千年前由菲律賓移入臺灣東北岸，再移居和平島。漢人跨海來往於和平島的歷史可溯自宋代，並呼應宋以降東亞海洋活動趨於旺盛的趨勢，並可能在元代形成季節性移居，至明末逐漸轉向定居性聚落。故在西元 1626 年西班牙人占領和平島之前，已有漢商漁工在島上居住營生。其後，島上漢人歷經了西、荷和明鄭統治的考驗，奠定清代漢人踵續移居生存繁衍的基礎。本文旨探討西班牙人占領以前漢人移居和平島的歷史進程與性質，以明島上歷史文化資產的內涵、根源，及其所蘊含之東亞海洋人文網絡的深遠背景。

一、前言

和平島位於基隆港的東北方，是基隆港的出入扼口。該島以「社寮島」為主體，並包含西側的「桶盤嶼」和北側「中山仔嶼」，東岸以狹窄的「八尺門」海道與臺灣島相隔；面積約 75 公頃，含海蝕平台則達到 82.98 公頃。¹ 據考古發現，距今 4500-3500 年前，島上就有新石器時代中期繩紋陶文化的人類聚落，與淡水河口的「訊塘埔文化」類同；其後則有距今 3500-2300 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圓山文化」、距今 2300-1800 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的「植物園文化」以及距今 1800-400 年前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其中，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玉料係從花蓮豐田而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合聘教授、海洋文創設計產業系合聘教授

**教育部 107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B 類)「打造國際旅遊島—社寮文化再現與地方產業佈建」子計畫—「地方故事與文化再現」計畫之部份成果。

¹陳孜鴻，《隆和平島公園地形景點評估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2014.6)，頁 2。

來，反映當時的和平島已與花蓮沿岸地區有商貿來往；鐵器時代的玻璃飾品則應來自中國大陸或東南亞。² 可見和平島上的先民自史前時代就已是北、東臺灣之間以及東亞海貿圈的一環，臺灣周圍海域一直存在海洋活動，人們沿岸或跨海航行。由於基隆和淡水處於大陸百越文化和黑潮文化交界的地理位置，故其史前文化亦兼有兩者文化的影響，並反映史前華南人民跨海遷居於此的可能性。這種歷史地理的背景，也造就歷史上雞籠、淡水的原住民向來擅於海洋貿易的特質。³

現存最早定居和平島的原住民是凱達格蘭族巴賽人 (Basai)，⁴ 傳說其族源自於菲律賓群島方向的 Sanasai 島，二千年前，經由臺灣東部，⁵ 飄流至北海岸登陸，於貢寮雙溪河口形成「舊社」，後個別擴展於今基隆、金包里、淡水一帶。⁶ 《基隆市志》載：「距今約一千年前，在舊基隆郡貢寮庄新社，住有府那賽島族人（平埔蕃人）約二百戶，業農漁，常因捕魚海上遇暴風雨避難來基，其俗尚以屍體埋葬寮下，致原有新裡寮社，盡成墓塚，無由發展，乃於六百餘年前率眾遷基，擇居於和平島八斗了及金包里一帶。」⁷ 今和平島和基隆地區一帶的巴

² 鮑曉鷗、洪曉純主編，《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臺北：南天書局，2014），頁 153-235。但陳宗仁認為雞籠、淡水自 7000 年前進入新石器時代，延續至 2000 年前轉為鐵器時代，與和平島考古資料有所出入。見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1400-1700》（臺北：聯經，2005），頁 27。

³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1400-1700》，頁 27-33。

⁴ 1900 伊能嘉矩將臺北盆地、淡水、基隆等北海岸的原住民歸稱為「凱達格蘭族」，1944 年小川尚義則主張北海岸與臺北盆地的人群有所差異，1956 年馬淵東一再予辨正，並根據人群自稱原則，才將北海岸和宜蘭沿海地區的人群命名為「巴賽人」(Basai)；後來雖有一些變動，但臺北、基隆沿海的原住民標示為「巴賽人」已成定局。17 世紀時的巴賽人，包含今日北海岸石門、金山、萬里一帶的金包里(Taparri)、大雞籠社(Kimaurri/ Quimaurri)、三貂社 (Olim Kiwamioan/ Caquiunaun 或 St. Jago)，以及東海岸蘭陽平原的哆囉美遠社(Telebeouan)、花蓮立霧溪口的哆囉滿社(Taroboan)等社。參見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頁 94-97；周子揚，〈十三行文化晚期舊社類型與 Basai 族關係之討論〉，收入鮑曉鷗、洪曉純主編，《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頁 65-66；康培德，〈文獻資料下的十七世紀北臺灣的海岸住民〉，收入鮑曉鷗、洪曉純主編，同引書，頁 73-77。但李王癸將「巴賽人」視為「凱達格蘭族」的支系。參見李王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宜蘭縣政府，1996），頁 40；166。現今一般仍泛稱臺北、基隆沿海的原住民為凱達格蘭人，較少人知道在基隆、金山、萬里、三貂一帶的是「巴賽人」。

⁵ 據 1930 年代馬淵東一調查，宜蘭、花蓮一帶廣泛流傳祖先來自於南方 Sanasai 島的傳說，謂其祖先由該島向北移入臺灣東海岸，繁衍至今。陳宗仁又據詹素娟建構的 Sanasai 傳說圈——即從臺灣東海岸到北海岸之原住民共享 Sanasai 的共同祖源，認為北海岸是此傳說的最北、最西界，也是其文化從東部北傳到淡水、雞籠一帶的例證。俱見於陳宗仁，前引書，頁 31-32。又李王癸認為凱達格蘭族的語言較像菲律賓語，而不像臺灣的南島語言。見李王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頁 171。則可推論 Sanasai 島似應位於菲律賓群島方向。又，李王癸原認為凱達格蘭族來到臺灣的時間約在二千年前。見李王癸，〈台灣北部平埔族的分類及其語言根據〉，《臺灣風物》，第 41 卷第 4 期，1991.3，頁 197-214。

⁶ 宋景秀採取伊能嘉矩的觀點，認為自稱為 Kivanowan 社的三貂人是雞籠社、金包里社以及廣大淡北地區凱達格蘭族的共同祖源；三貂人的代表性文化「舊社類型」約四百年（1390-1790）。見氏著〈嘉慶以前三貂鹽寮地域史的建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1996.6，頁 112-113。

⁷ 《基隆市志·地政篇》（基隆：基隆市政府民政局，1957.3 初版，1981.6 再版.），頁 9。該書所載「府那賽島」應即 Sanasai 島；其謂基隆巴賽人係自貢寮移入，此與宋景秀考證相呼應；又謂其約於六百多年前移入基隆，則相當於三貂人「舊社類型」文化的初期。是否確於六百年前移入

賽人，係於何時移入尚待商榷，但六百多年前以降，基隆巴賽人及其後代所生活的地方，即和平島及鄰近山嶺地區，有時候是指北部臺灣或整個臺灣，在元明清文獻中曾以「琉球」、「瑠球」、「小琉球」、「東番」或「雞籠」的名稱標示。

此外，和平島及其鄰近的山嶺地區，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經是東亞海洋網絡的重要地標——它是宋元以降從福建出發，經「東洋航路」向北到琉球、日本，向南到呂宋(菲律賓群島)，以及由呂宋到日本的航線地標，為東洋航線的中繼站。⁸ 中國從隋代起即稱臺灣為「流求」，宋元亦沿稱為「流求」或「琉球」、「瑠球」。明代初期開始將「琉球」這個稱號專給今琉球群島的王國，明初的文獻和海圖則改稱北臺灣為「小琉球」，明中葉以降又再改稱分別為「雞籠」、「淡水」。⁹ 其中「雞籠」或「雞籠山」即指和平島及鄰近山嶺地區；一直到 19 世紀初以前，明清文獻中的「雞籠港」實指和平島而言。¹⁰ 在 16-17 世紀時它一直是東亞海洋網絡中的國際轉口貿易中心。

除了最早定居的原住民凱達格蘭族巴賽人外，漢人跨海往來於和平島活動的歷史，根據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可溯自宋代，並呼應宋以降東亞海洋活動趨於旺盛的趨勢，繼而可能在元代形成季節性移居，至明末逐漸轉向定居性聚落。換言之，在 1626 年西班牙人占領之前，和平島就已是中、日商人從事貿易以及漢人漁民作業的據點。明末島上漢人歷經西班牙人、荷蘭人和明鄭統治的考驗，為日後清代移民奠定生存繁衍的基礎。其後，清朝納入版圖，乃至晚清日本殖民統治迄於光復至今的變遷，從早期的漁商往來到後來的孳養生息，賡續不絕，已是目前島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其日常生活、營生方式、民俗信仰、人際網絡主導了當代和平島地域文化的內涵、符徵與節奏。有關漢人移民臺灣的歷史，雖不乏前人研究成果，但多偏重於全臺灣的論述；對歷史上位居東亞海洋網絡重要位置之和平島的專題研究，概以陳宗仁的《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1400-1700》為代表，唯其較偏重於 16-17 世紀問題的討論。本文則旨在探討西班牙人占領以前漢人移居和平島的歷史進程與性質，包括季節性移居與定居性移居，¹¹ 以明當地歷史文化資產的內涵、根源，及其所蘊含之東亞海洋人文網絡的深遠背景。

仍待考證。

⁸ 向達校註：《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37~138；1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1400-1700》頁 63-77，81-87。

⁹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1400-1700》，頁 63-73。

¹⁰ 涂振源，《基隆和平島的地方敘事之反思與重構—地圖與繪圖取徑下的批判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7），頁 40-45。

¹¹ 本文所討論的漢人「移居」，係採用江樹生論臺灣漢族移民的觀點，亦即指所有自中國大陸移居臺灣的漢人，包括季節性移居與永久性移居。見江樹生，〈清領以前臺灣之漢族移民〉，《史學彙刊》，第三期，1970.8，頁 89。

二、跨海和巴賽人的祖先相遇：宋代漢人的來往商貿

連橫《臺灣通史》謂：「歷經五代，終及南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臺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¹² 江樹生以為上述連橫的說法，文獻不足、缺乏確據；¹³ 陳漢光則採信此說，並徵引其他文獻論證：南宋時代就有少部份漢人移民臺灣，唯可能難以立足或被原住民同化，而不知其存在。¹⁴ 1990年代前後，淡水河口「十三行文化遺址」出土了漢朝的五銖錢、唐朝的開元通寶、宋朝的太平通寶、淳化通寶、至道元寶和咸平通寶等銅錢以及華南製造的瓷片，考古學者臧振華據此推測：唐宋時期的漢人可能曾航行至此與臺灣住民交易。¹⁵ 由此可見，宋代漢人即已跨海來臺登岸交易，已有文獻和考古資料的互證。和平島上出土的宋元青瓷、明代的克拉克瓷、安平壺以及明清之際的青花瓷等文物，¹⁶ 則說明島上鐵器時代（距今 1800-400 年）的後半已出現漢人足跡，也反映宋代漢人來臺交易的範圍可能不止臺灣中部的北港，還擴及於北臺灣的和平島。

據文獻記載，北宋時代可能就有漢人來到北海岸貿易，甚至及於和平島及鄰近山嶺地區。宋神宗元豐 2 年（1079）進士李復的〈潘水集〉轉載其時邵武知縣張士遜所編集的「閩中異事」一段記述：

泉州東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無狂風巨浪二日至高華嶼。嶼上之民作養腊魚今魚差者千計；又二日至句黽 辟黽 嶼，句黽 辟黽 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國。其國別置館於海隅以待中華之客。每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登高極望有三數點如覆釜，問耆老云：是海北諸夷國，不傳。¹⁷

上文中的「流求國」即指臺灣。唯文中「至高華嶼。...又二日至句黽 辟黽 嶼，...又一日至流求國。」等字句係襲自《隋書·流求傳》：「（大業四年）...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句黽 辟黽 嶼，又一日便至流求。」¹⁸ 按洪連成先生綜合中外學者說法，《隋書》中的「流求」即指臺灣，義安為今潮州，高華嶼和句黽 辟黽 嶼即今澎湖的花嶼和奎壁，¹⁹ 則所描述的應是隋代從潮州出發、經澎湖再東進臺灣西部海岸的路線。²⁰ 曹永和曾詳細比對宋代文獻傳抄《隋書·流求傳》的情形普遍，並認為所指登陸

¹² 連橫，《臺灣通史》（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6），頁 5。

¹³ 江樹生，〈清領以前臺灣之漢族移民〉，頁 92。

¹⁴ 陳漢光，《臺灣移民史略》（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1971），頁 6-7。

¹⁵ 臧振華，〈考古學與臺灣史〉，收入氏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頁 729。

¹⁶ 鮑曉鷗、洪曉純主編，《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頁 238-261。

¹⁷ 〔宋〕李復，《潘水集》，收入《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三，別集類，第五卷，頁 19-20。

¹⁸ 〔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93），卷八十一，東夷傳，流求國，頁 1825。

¹⁹ 洪連成，《基隆市志·風俗篇》（基隆：基隆市政府，1979），頁 2。

²⁰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事業公司，1979），頁 75。

的「流求」當指臺灣中南部。²¹

「閩中異事」抄自隋書經泉州由高華嶼和句厓 辟厓 嶼的五日航程，想必亦是宋人傳抄隋書風氣的產物，但從其後文來看，宋人登陸臺灣活動的範圍，應不僅止於中南部，故該路線未盡合理，須暫存疑。蓋「閩中異事」描述：「每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登高極望有三數點如覆釜，問耆老云：是海北諸夷國。」彷彿就是描述在基隆鄰近高山極目遠望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等北方三島²² 的情景——臺灣海岸也就只有此處較有可能北望「三數點如覆釜」的海域；是則和平島很可能就是所述「其國別置館於海隅以待中華之客」的地點之一，正可與和平島出土的宋代青瓷相印證呼應。²³

此外，宋人趙汝適的《諸蕃志》記載與泉州往來的海外各地，亦包含被稱為「流求」的臺灣在內。其描述「流求」物產：「墾之無他奇貨，尤好剝掠，故商賈不通。土人間以所產黃蠟、土金、鼈尾、豹脯往售於三嶼。」²⁴ 雖曰「商賈不通」但其謂又土人以當地物產航海往售於「三嶼」。按《元史·外夷傳》載：「三嶼國，近瑠求（按：即臺灣），...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²⁵ 可見三嶼有漢人居住，並可能說著漢語中的一種方言。曾有三嶼人名陳輝者，於至元二十九年隨元軍出征瑠求，可能擔任通譯；未料元軍登岸所遇人眾不通三嶼人語，而被殺死三人，但元史對此次出征所至是否為瑠求，似不能確定。²⁶ 據中外學者考證，一般以為「三嶼」位於今馬尼拉灣的南北兩岸。²⁷ 除了前述三嶼人陳輝以外，亦可由當年元征瑠求軍船經過其三嶼國，其國人餉以糧食，還提供館舍給元軍將校，無有隔閡等情，²⁸ 可以推知宋元時代「三嶼」多漢人，並在海洋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上述「三嶼」的敘事可知，宋元時代出現「流求土民（臺灣）—三嶼人（馬尼拉灣）—泉州人（大陸東南）」的海貿網絡，而且活動。由於「流求土民」往售三嶼的「土金」產自北、東海岸山區，說明北臺灣以及和平島也在此網絡之中。此外，相對於元朝軍隊第一次登陸所遇部落語言不通，前往三嶼販售的「流求土民」不但擅於貿易而且應能與三嶼人溝通，此與巴賽人的特性甚為相符，憑添今人對和平島在宋元時代東亞海貿網絡角色的認知與想像。

²¹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頁 79-98。

²² 彭佳嶼最高點海拔 129 米，距離基隆港 56.2 公里；棉花嶼位於基隆東北方約 42 公里，其東側海域另有一岩礁，高 25 米；花瓶嶼位於基隆港東北方約 32 公里；今合稱「北方三島」，其行政區畫與和平島同屬基隆市中正區。

²³ 鮑曉鷗、洪曉純主編，《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頁 238-239。

²⁴ 〔宋〕趙汝適，《諸蕃志》，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十，卷上，流求，頁 46~47。

²⁵ 〔明〕宋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93），卷二百一十，外夷三，三嶼，頁 4668。

²⁶ 〔明〕宋濂，《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三，瑠求，頁 4668。

²⁷ 據蘇繼頤綜合各家注《島夷誌略》「三島」所在位置，見〔元〕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第一版，2000 二刷），頁 24-25。

²⁸ 〔明〕宋濂，《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三，三嶼，頁 4668。

陳漢光認為至遲南宋時代就有漢人移民臺灣，但終究不存或融入原住民部落。就和平島地區而言，根據現有文獻和考古資料，只能推測宋代漢人商貿足跡曾到此地，尚無跡象可證其融入原住民部落或曾經形成移居聚落。

三、由移動轉向定居：元明漢人移居性質的變遷

(一) 元代季節性移居的可能

元代稱臺灣為「琉球」或「瑠球」，對臺灣的認知已遠過於宋代，漢人跨海來臺貿易的活動也比過去更鮮明。像汪大淵這樣的航海商貿旅行家，即曾隨商船親臨臺灣，甚至可能到過北海岸和平島一帶。此可由其所撰《島夷誌略》有關記述得知一二。文曰：

琉球 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崎。其峙山極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夜半則望暘谷之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土潤田沃，宜稼穡。氣候漸暖，俗與澎湖差異。水無舟楫，以筏濟之。男行婦人拳髮，以花布為衫。……地產沙金、黃荳、黍子、琉黃、黃蠟、鹿、豹、鹿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磁器之屬。海外諸國蓋由此始。²⁹

汪大淵在至正年間，約 1330-1345 年間，³⁰ 隨商船航行海外各地並加以記錄，其自許「皆親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³¹ 故其所述當可視為接近真實。蘇繼頤注汪大淵著《島夷誌略》，謂汪所述「琉球」範圍當在臺灣中南部；³² 但陳漢光認為應指大肚山以北之臺灣，並謂「大峙山」（按：蘇校本作大崎山）就是汪大淵在澎湖可見到的「峙山」，應即今大肚山；江樹生採用其說，亦認為汪大淵本人曾到過臺灣中北部，大肚山就是汪大淵所登臨看日出、觀潮汐的地方。³³

但問題出在不應把汪大淵在澎湖可看到臺灣的「峙山」與他在臺灣所登之山混在一起。據汪大淵所述，他從澎湖看到極高峻的「峙山」，當指玉山才有可能，在澎湖是看不到大肚山的；玉山雖有日出，但謂汪大淵登上玉山觀潮汐則不太實際。細看其文，他先敘述在澎湖能看到聳立在臺灣的高山（其峙山極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而後說明他所登上的則是可觀日出和潮汐的山頭（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夜半則望暘谷之日出），「則」一字可解為他所登之山，與他從澎

²⁹ 〔元〕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17。

³⁰ 〔法〕鄂盧梭，〈記《島夷誌略》〉，收入《島夷誌略校釋·附錄》，頁 395-396。

³¹ 〔元〕汪大淵，〈島夷誌後序〉，收入《島夷誌略校釋》，頁 385。

³² 〔元〕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19-20。

³³ 陳漢光在其他的版本，謂汪大淵所登的是大屯山，其間出入可能筆誤造成。見陳漢光撰，《臺灣移民史略》（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1971），頁 9；江樹生，〈清領以前臺灣之漢族移民〉，頁 92-93。

湖可望見的高聳「峙山」並非同一座山，而是可以看到日出又可直觀海潮漲退的近海山頭。但這樣的山頭會在哪裡呢？本文以為在北海岸和平島的可能性並不小。

蓋汪氏所見「琉球」物產中，沙金係產於基隆附近山區，硫磺則出自大屯山；其他像黃荳、黍子、黃蠟、鹿、豹、麕皮等，亦臺灣北部可以出產之物。至於外來貨品，其中「土珠」是中國燒製的玻璃珠，處州磁器當指龍泉窯，是南宋名窯，至元代仍流傳甚廣。³⁴ 而玻璃珠和元代龍泉窯青瓷都是和平島出土極具代表性的外來文物，³⁵ 與汪大淵所見到漢人與土著交易的貨品可相印證。綜上所述，自少年時起就跨海行商的汪大淵，既隨船來到北臺灣，極可能造訪當時北海岸最大的兩座市場——和平島和淡水河口；則其登上附近臨海山麓觀日出潮汐的可能性並不小，蓋在和平島不但可直觀海潮漲退，亦可在東砲台山頂觀看山谷的日出。不但比登淡水河口的觀音山可能性大，而且遠比登大肚山更符合汪大淵所述「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夜半則望暘谷之日出」的情境。

汪大淵一生出海遠航二次，都是經由泉州出發，歷經數年才返國；第一次是西元 1330~1334 年；第二次是西元 1337~1339 年。³⁶ 其跨海來到臺灣應是這兩次航程中的一站。但在此之以前，早有漢人漁夫販卒來往營生於兩岸之間，且航路並不止泉州一線。《元史·外夷傳·瑠球》載曰：

瑠球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球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晴朗時，望之隱約若雲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瑠球則謂之落滌；滌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滌，回者百一。瑠球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

37

如上所述，元代漢人已能準確掌握臺灣與福建四州之間、與澎湖之間的相對位置，及其西、南、北岸皆臨海，與澎湖之間有黑水溝、颶風的海域特性和風險。江樹生推論：元代抵達臺灣中北部的漢人當包括漳州、泉州、興州、福州之民，其渡臺航道亦是漳、泉、興、福各有針路；而且四州之民漁貿於臺澎之間，活動頻繁，乃對臺澎海域的狀況、天險與風災有所理解並加記錄，甚至或已形成季節性移民。³⁸ 按此，就前述與和平島相關文獻和出土的元代文物而言，或可呼應其說，推論當時和平島可能已有季節性移居的漢人存在。

（二）明代漢人轉向定居的趨勢

³⁴ 〔元〕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21-22。

³⁵ 鮑曉鷗、洪曉純主編，《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頁 240-243。

³⁶ 蘇繼頤，〈敘論〉，收入《島夷誌略校釋》，頁 10。

³⁷ 〔明〕宋濂，《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三，瑠求，頁 4668。

³⁸ 江樹生，〈清領以前臺灣之漢族移民〉，頁 93。

現藏於英國牛津大學題為《順風相送》的明初鈔本針簿，³⁹ 其底本概為永樂 7 年（1409）左右所遺，上載由福建往琉球的航路，把和平島標為「小琉球頭」，楊國楨註此「小琉球頭」就是和平島，並整理其路線為：由太武往烏坵到東墘（湄州）開洋，或東湧（馬祖東引）開洋，或梅花（位於長樂）開洋，經小琉球頭（臺灣基隆和平島）—彭家山（彭佳嶼）—花瓶嶼—釣魚嶼—赤坎嶼—枯美山（琉球久米島）—古巴山（琉球慶良間群島）—琉球國濠霸（今那霸），由此又可銜接日本松浦（平戶）來往呂宋以及琉球來往日本兵庫的航線。⁴⁰ 明嘉靖年間抗倭名臣胡宗憲的《籌海圖編》亦稱和平島及其鄰近山嶺為「小琉球」，而稱現在的琉球群島為「大琉球」。⁴¹ 此外，出使琉球國的明朝使節，自嘉靖 13 年起記錄詳細航程，亦把基隆和平島一帶標示為「小琉球」或「小琉球頭」⁴² 由此可見，明初已被改稱為「小琉球頭」的和平島，已是由中國福建—琉球國—日本航路必經的中繼站。

「小琉球」在明中葉以前，又稱為「小東島」，概指包含淡水、大屯山以及和平島、雞籠山一帶地區。由於倭患頻仍，新安人鄭舜功於嘉靖 34 年（1555）至日本探查，返國撰著《日本一鑑》，附有臺灣島圖，圖上即繪有「雞籠山」並記有小東島出硫磺。文曰：

自回頭徑取小東島，島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國。按此海島，自泉永寧間，抽一脈渡海，乃結澎湖等島，再渡諸海，乃結小東之島。自島一脈之渡，西南乃結門雷等島；一脈之渡，東北乃結大琉球、日本等島。小東之域，有雞籠山；山乃石峰，特高於眾中，有淡水出焉。⁴³

雖然鄭氏將航線上的雞籠山和出硫磺的大屯山混在一起，但已顯示和平島及其鄰近山嶺，位於連結澎湖、泉州，西南航向金門、雷州等島，東北通往大琉球和日本的航路要道與關鍵地標，並反映其具有在臺海兩岸、國際海貿市場的潛力。鄭氏的認知必來自於當時來往熟悉「小琉球」和「雞籠山」的漢人。明代中葉以後，和平島已從「小琉球頭」改稱「圭籠頭」⁴⁴ 或「雞籠山」、「雞籠」。隆慶、萬曆年間解除海禁後，漢人前往貿易明顯增加。

³⁹ 收藏在英國牛津大學的《順風相送》手抄本，係 1638 年 Michael Shen 訪問牛津大學所遺，他還在「順風相送」旁附上「Xin Fum Siam Sum」羅馬拼音。參見 Brook, Timothy, 2013,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p. 127.

⁴⁰ 楊國楨：《閩在海中：追尋福建海洋發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頁 66。

⁴¹ 該書載從福建前往日本的針路：「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雞籠嶼發梅花、瓶嘉山。」「其人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明〕胡宗憲，《籌海圖編》，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五，邊防之屬，卷二，頁 11；34。

⁴²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1400-1700》，頁 50-56。

⁴³ 〔明〕鄭舜功，《日本一鑑》，轉見於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頁 137。

⁴⁴ 《指南正法》載：「蚊港亦叫台灣，係是北港，身上去淡水上是圭籠頭，下打狗子。」參見向達校註：《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37~138。「圭籠頭」當指和平島，閩南語發音「雞籠頭」的意思。

《明史·外國傳》載：嘉靖末年，倭寇擾閩，為戚繼光所敗，逃到雞籠（和平島）遁居，並焚掠雞籠，原本住在島上海濱的部落殘破，乃避居於山後；不久即有中國漁船從魷港（即蚊港）飄至，遂往來貿易，習習以為常；而自雞籠、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達；東北至日本，七十更可達。⁴⁵ 其除了說明航線以外，也附上航行時程，反映明代中葉以後，中國海商漁民時到雞籠（和平島）營生，並由此通往日本的通道。此外，日本人也可能到此貿易。1903年英國倫敦出版的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即述及 16 世紀末雞籠已有日本人，而且從事採金。⁴⁶ 此所以 1626 年西班牙人登上和平島時，發現島上竟已有中國人與日本人市集的原由之一。⁴⁷

自隆慶年間解除海禁到萬曆年間，漢人來到雞籠（和平島）貿易居留的較前常見，並被當時航經臺灣海域的歐洲人留下記錄。萬曆 10 年（1582）⁴⁸ 3 月西班牙船長 Francisco Gualle 自墨西哥阿卡普魯科港（Acapulco）經菲律賓抵達媽港（按：指澳門）；同年 7 月 24 日又由該港出發，往東南東航行，經由臺灣東岸，再於臺灣東北面海域，轉向東北及東微北而行。該船長並於航海日記述及，一位名叫 Santy 的漢人所說有關「美麗之島」東北端的情況：

吾等向東南東航行一百五十哩，經過砂地及琉球諸島入口，亦即諸島之東岸。此名乃「美麗之島」之意，此乃余聞自漳州（Chincho）（按：應譯為「泉州」較為合理）⁴⁹ 名為 Santy 的中國人而知者。...通過此美麗之島後，航線轉向東北及東微北，行二百六十哩（換言之，吾人航畢 Islands Lequeos 所有全緯度，亦即全長度。吾人在該處必須離開陸地五十哩航行。）上述華人告余謂，該諸島稱 Islands Lequeos，其數甚眾，富良好港灣，居民之面孔及身體，與呂宋即菲律賓群島之 Visaya 相似，服裝亦同。彼又謂：其地有金礦，島民時駕小舟攜野鹿、皮革、小粒金及極精細工藝品，運往中國海岸交易。並稱所言確為事實，蓋彼曾九度親赴該諸島，將同樣商品，由該地用船載往中國沿岸。後余在媽港及中國沿岸調查，證明此中國人所言確屬實情，余亦深信如此。此等諸島之東北端位於二十九度。⁵⁰

⁴⁵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93），卷三百二十三，外國四，頁 8376-8377。

⁴⁶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903, p. 464. 轉見於中山孝志原著，賴永祥、王瑞徵譯，〈十七世紀荷人勘察臺灣金鑛紀實〉，《臺灣文獻》，第七卷，一、二期，1956.6.27，頁 97-98。

⁴⁷ [西]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e Maria Alvarez）原著，李毓中、吳孟真譯著，《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6年），頁 37。

⁴⁸ 此日期江樹生誤植為嘉靖 37 年（1558）。見江樹生，〈清領以前臺灣之漢族移民〉，頁 94-95。今據中山孝志原著〈十七世紀荷人勘察臺灣金鑛紀實〉，頁 96 所載內容修正。

⁴⁹ Chincho 中山孝志原譯為「漳州」，一般中日學者概接受其譯。但 Chincho 西班牙語發音並不符閩南語發音的「漳州」（ziangziu）和閩南語發音的「泉州」（zuanziu），反而較近於廣東話發音的「泉州」（chuinzao）。本文推斷 Santy 是一位會說廣東話的泉州人，概為因應當時國際貿易要港澳門是講廣東話的環境，他向西班牙船長說明出身時，可能用廣東話發音「泉州」，而被記錄為「Chincho」。綜上所述，中山孝志將 Chincho 譯為「漳州」應為誤譯，「Chincho」譯為「泉州」變為合理。

⁵⁰ Roys-gheschrift van 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ers 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van Jan

上文不但記錄了 16 世紀末西班牙人由美洲—太平洋航線—菲律賓—澳門—臺灣東岸—抵達琉球之狀況，並透露當時漢人尤其是閩南人活躍於東亞海域以及閩臺二岸貿易的實情；再者，這位常到「琉球諸島」(Islands Lequeos) 名叫 Santy 的漢人所言該島有金礦、產粒金的地方，當指基隆鄰近山區，則和平島即是島民和漢人從事臺海兩岸的貿易港。而此情形澎湖和中國沿岸地區都知情認證，可見 16 世紀末漢人到和平島貿易已甚普遍。和平島位居菲律—中國—琉球—日本航線要津、出產黃金、貿易繁盛、漢人來往以及島民類似菲律賓土著等等情報，觸動西班牙人進一步勘查雞籠。1597 年 Hernando de los Rios 不但提出調查報告，並附上只標出「雞籠港」和「淡水港」的臺灣全島以及周邊菲律賓、中國沿海的地圖，對雞籠加以正面描述，謂其面向日本，鄰近中國，可以從中國獲得給養，從日本得到銀的供應，積極鼓吹進占雞籠。⁵¹ 1619 年明道會士 Bartolome Martinez 寫於馬尼拉的報告〈征服福島的益處〉也鼓吹征服福爾摩沙，但建議在 Pacan (北港) 建立堡壘。⁵² 數年後，西班牙軍隊果然於 1626 年由馬尼拉開拔，但選擇在北臺灣的三貂角登陸，並決定雞籠為統治的中心。可見 Hernando de los Rios 對雞籠和淡水的調查報告發揮了決定性影響。

前述漢人 Santy 所述「琉球諸島」島民的體型、服裝與菲律賓群島之 Visaya 相似，此一則印證文化人類學所認為，包含巴賽人在內的臺灣原住民，有一部份係源自菲律賓的說法；另一方面 Visaya 當即宋代曾寇掠澎湖、泉州一帶的「毗舍耶」，⁵³ 則可佐證日本學界認為宋代「毗舍耶」係來自菲律賓的說法並非無據，⁵⁴ 而且一直到明代後期，活躍於東亞海域的漢人，仍知呂宋有 Visaya 人的存在與外貌。

西班牙船長 Francisco Gualle 上述航經臺灣的路程，實包含前述大、小琉球。由漢人 Santy 用「琉球諸島」(Islands Lequeos) 的表述來看，降至明萬曆初年，部份人民仍然以「琉球」之名表述臺灣或臺灣北部。唯隨著漢人至臺灣從事商貿、漁業者日眾並形成鮮明聚點，遂使雞籠、淡水成為明朝官方認可而給予船引的港口。據曹永和的研究，自嘉靖末年到萬曆初年，漢人商、漁船已常見於臺灣海岸，南從北港，北到淡水、雞籠的海岸。⁵⁵ 當時台灣雖然還沒有進入明朝版圖，但已將雞籠、淡水視為船引制實施的範圍，並可與已當時島上的漢人有所連結。

Huygen van Linschoten 1579-1592. 5de deel. Linschoten Vereeniging, XLIII, 's-Gravenhage'. 1939, blz. 289-290. 轉見於中山孝志原著〈十七世紀荷人勘察臺灣金鑛紀實〉，頁 96-97。

⁵¹ 轉見於陳宗仁前引書，頁 143-147。

⁵² Bartolome Martinez, "Conveniencia de la conquista de Isla Hermosa," 鮑曉鷗、洪曉純譯，〈征服福島的益處·節錄〉，收入《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附錄 2，頁 355。

⁵³ [宋]趙汝適，《諸蕃志》，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十，卷上，毗舍耶，頁 47。

⁵⁴ 日本和田清博士綜合各家說法，主張毗舍耶即菲律賓的 Visaya 人；但梁嘉彬教授則加以批駁，認為其僅是臆測之詞，力主宋代的「毗舍耶國」確在臺灣。參見曹永和相關討論，氏著〈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頁 95-99。

⁵⁵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165。

萬曆 2 年（1574），福建巡撫劉堯誨題請舶稅充餉，歲以六千兩為額。並規定凡販東西二洋、雞籠、淡水諸番及廣東高、雷州、北港等處商漁船引，俱海防官為管給，每引納稅銀多寡有差，名曰「引稅」。東西二洋每引納稅銀三兩，雞籠、淡水及廣東引納稅銀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稅銀二兩。萬曆 17 年（1589），福建巡撫周案建議制定限船之法，規定往東西兩洋的船隻總數，以及通商區域及各區域的船隻數，雞籠、淡水亦包含在內；獲兵部覆准東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隻，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私販者多，再增至一百一十引。⁵⁶

如上所述，明朝規定雞籠、淡水的船隻數量與閩、浙、粵等省同一等級，並且雞籠、淡水的引稅數額與廣東同樣，只占東西洋的三分之一。此反映沿海漁商船隻，前往雞籠可能增多，雖然雞籠、淡水未納入版圖，但在明朝政府的心目中，船隻赴雞籠、淡水，即等同於在國內沿海各省，而有別於前往東西二洋進行國際貿易的船隻。此或由於明朝已經意識到：雞籠雖未入版圖亦未稱國；唯因其位於自家門外要地，不能以外國視之。⁵⁷

在明朝政策認可沿海漁商船隻航行到雞籠、淡水的趨勢下，至萬曆晚期，明代文獻對雞籠、淡水描述較前增多，並呈現出漢人與巴賽人互動的生活樣態。成書於萬曆 45 年（1618 年）張燮的《東西洋考》就描述，當時雞籠、淡水的巴賽人喜歡並珍惜漢人的衣服；他們不時透過交易得到漢人衣服，但平時不穿，只在重要場合，例如與漢人會面時，才特意同時穿著展現十多件短長漢服，以炫耀其華奢。⁵⁸ 由此可見，其日常穿著和審美觀逐漸受到漢人影響之一斑。但漢人的飲食口味仍難被巴賽人所接受。《東西洋考》記曰：

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篤嗜鹿腸，剖其腸中新咽草旨噉之，名「百草膏」。畜雞任自生長，拔其尾飾旗；射雉亦拔其尾。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島中，不善舟；且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蓋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厥初，朋聚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魷港飄至，遂往以為常。其地去漳最近，故倭每垂涎；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

交易：夷人舟至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雞籠人差富而慳，每攜貨易物，次日必來言售價不準，索物補償；後日復至，欲以元物還之，則言物已雜，不肯受也。必疊捐少許，以塞所請；不則，喧譁不肯歸。至商人上山，諸所嘗識面者，輒踴躍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絕島好

⁵⁶ 《漳州府志·洋稅考》摘錄，收入《清一統志·臺灣府》附錄（臺北：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八輯，不著年月），頁 62-63。

⁵⁷ 〔明〕張燮論曰：「雞籠雖未稱國，自門外要地。」見張燮，《東西洋考》，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 卷五，頁 21。

⁵⁸ 〔明〕張燮，《東西洋考》，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 卷五，頁 18。

客，亦自疏莽有韻。⁵⁹

上文描述萬曆年間，和平島上的漢人與巴賽人飲食習慣有重大差異，以及交易的習慣和個性；此外，也反映幾點當時漢人生活的訊息：（一）漢人可能在此逐漸形成定居聚落：巴賽人不養雞，不食雞，只是拔其毛尾以裝飾；漢人食雞雉必當自行烹調，自備相關器皿食材調料，甚至可能出現了服務商旅食宿的店家以及往返居留的商貿漁工聚落。（二）漢人重建了雞籠的貿易市場，與巴賽人密切互動：嘉靖末年倭患摧毀了雞籠部落，巴賽人避居山；後漢人由魴港北上雞籠，重建貿易市場。登島的漢商常被認識的巴賽人邀請到家作客。（三）明朝把雞籠納為防倭抗倭的海防範圍：雞籠與漳州相距不遠，易引起倭寇覬覦；於是由福建派出偵探，一年進出雞籠多次，反映出萬曆後期，漢人在雞籠的活動已不只為了從事漁業商貿，而延伸到明朝海防抗倭相關事宜。

雞籠（和平島）面臨明朝海防新情勢，係萬曆後期倭寇在東亞海域跨國擾掠的產物。⁶⁰ 先是豐臣秀吉於萬曆 20-24 年（1592-1596）、25-26 年（1597-1598）兩度入侵朝鮮，明朝分由海、陸二線前往支援。在海線部份，明朝在大陸沿海島嶼的佈防，北起渤海、黃海，南迄東海閩浙，不敢掉以輕心。萬曆 26 年正月，並調撥浙江、福建、廣東各省慣戰舟師，從海路進攻被倭寇占領的朝鮮的閒山島，因戰事失利，明朝改以閩廣商販跨海聯結，因勢利導，加以離間。⁶¹ 後戰事因豐臣秀吉死亡、明兵征倭告捷而告終結。⁶²

日倭入侵朝鮮雖長達七年，但並未得到與中國、朝鮮和平貿易的結果，乃把目標轉移到琉球。萬曆 37 年（1609）日本薩摩藩發兵三千侵入琉球，執中山王，遷其宗器。⁶³ 薩摩藩併吞琉球，係望能假借琉球的名義，對明朝進行朝貢貿易。⁶⁴ 除了入侵琉球外，倭寇又於萬曆 40 年（1612）侵入寧波、溫州等地島嶼。萬曆 44（1616）年 5 月左右，倭寇再度侵犯寧波外海、大陳島、溫州、南麂島等地，皆為明朝官兵所逐。明朝兵部乃加強海防，令以溫州、台州、寧波三區俱屬防倭要衝，雞籠、淡水則正對南麂，尤當日夕戒嚴。⁶⁵ 正式將雞籠、淡水納入與閩浙一體的海防範圍。

此外，同年 6 月，琉球國中山王遣通事蔡廬來言：邇聞倭寇各島造戰船五百餘隻，欲協取雞籠山，恐其流突中國，為害閩海，故特移咨奏報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黃承玄以聞；謂雞籠逼我東鄙距汎地僅更數水程，倭若得此，益旁收東番諸

⁵⁹ 〔明〕張燮，《東西洋考》，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 卷五，頁 20。

⁶⁰ 參見黃麗生，〈明代萬曆時期的島嶼議題：以《明實錄》為中心〉，《海洋文化學刊》第二十一期（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出版，2016 年 12 月），頁 10-24。

⁶¹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神宗，卷 314，頁 5868-5869；卷 318，頁 5922。

⁶² 〔清〕谷應泰：《明史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62，〈援朝鮮〉，頁 972-978。

⁶³ 《明實錄》，神宗，卷 496，頁 9432。

⁶⁴ 何慈毅：《明清時期琉球日本關係史》（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52-57。

⁶⁵ 《明實錄》，神宗，卷 551，頁 10417-10418

山，以固其巢穴，然後蹈瑕伺間，惟所欲為；倭若犯福寧，則閩之上游危；越東湧以趨五虎，則閩之門戶；危薄澎湖以瞰漳泉，則閩之內地；危非惟八閩患之，恐兩浙未得安枕也。⁶⁶ 蔡廬的分析突顯了雞籠對閩浙安全的重要，而其主動通報倭寇侵臺動向，並不只是為了中國防倭所需，也是出於琉球自身安全的考量。而後雞籠果然經成為倭寇侵犯的目標。

萬曆 45（1617）年 4 月，巡按福建監察副御史韓仲雍，曾召來被俘的倭目以及船中頭目，問其何故侵擾雞籠、淡水？何故謀據北港？何故擅掠內地及侵奪琉球等事，俱以甘言對。乃續諭令：所經浙境乃天朝之首藩，迤南而為臺山、為礮山、為東湧、為烏坵、澎湖，皆我閩門庭之內，豈容汝涉一跡？以上年琉球之報，謂汝欲窺占東番（按：即雞籠、淡水）、北港，傳豈盡妄？汝若戀住東番，則我等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以過番。言畢，倭目、船中頭目等各指天拱手連稱不敢，隨差官押送定海所而去。⁶⁷ 韓仲雍以海貿利益勸倭放棄掠寇，但倭寇對東番也就是雞籠、淡水的意圖或未稍減。

萬曆 45 年（1617）8 月，倭寇又欲入侵雞籠、淡水而不能得逞，很可能是對中國的忌憚。蓋當時分巡福寧道右布政使黃琮報、把總何承亮圍襲倭船，所獲 67 名皆長崎島倭，謂因其酋長等安遣其子秋安謀犯雞籠、淡水，屢失利而不敢歸，轉而侵入浙台地方，復前往南麂、白犬澳等處搶擄漁戶往來？掠，適遇颶風遂為明兵擒獲。⁶⁸ 如上所述，從當時倭寇侵犯的區域路線來看，其進犯雞籠不成後，常以閩、浙沿海地區為劫掠目標；明朝海軍乃將雞籠納為閩浙海防系統的範圍。

上述倭寇在東亞海域跨國擾掠，而明朝將雞籠納入海防範圍的情勢，即《東西洋考》謂雞籠、淡水：「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的時事背景。再者，和平島天后宮為北灣最早成立的媽祖廟，並流傳其建廟始末謂：明朝時，有漢人船隻因風浪停泊在社寮島，後因船上供奉的湄州媽祖顯靈示意要留在島上，居民乃置茅屋供奉；此外，該廟原存有「海波不揚」的匾額，傳說係明萬曆年間李欽差奉諭送來的御賜寶物。⁶⁹ 此匾雖已不存，但有關它的歷史記憶，正與明朝將雞籠納入海防範圍，以及《東西洋考》：「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的敘事相呼應。綜上所述或可推論：至遲在明萬曆晚期，漢人已在雞籠（和平島）建立了媽祖廟，她不但是定居聚落的象徵，並成為明朝官方與當地漢人連結的管帶。

和平島出土的考古文物，亦可佐證上述推論的可能性。島上明代文物主要有：克拉克瓷、安平壺和青花瓷。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是萬曆年間盛產並首批大量輸往歐洲的中國瓷器。和平島出土的克拉克瓷盤，其裝飾花樣在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初，在馬來西亞發現約 1625 年的「萬曆號」沈船也可見到。安

⁶⁶ 《明實錄》，神宗，卷 546，頁 10352—10353。

⁶⁷ 《明實錄》，神宗，卷 560，頁 10557-10559。

⁶⁸ 《明實錄》，神宗，卷 560，頁 10564-10565。

⁶⁹ 柯淑純、林玉齡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基隆：基隆市文化中心，1995），頁 88-89。

平壺在 16 世紀末至 18 世紀期間也常見於東南亞各地，是一種主要產於福建和廣東的陶器，大多輸往東南亞地區，作為裝鹽、食物及液體的器皿。和平島出土的安平壺數量還不少。此外，和平島所出土的青花瓷大約是 17 世紀晚期，出自福建南部的燒窯。⁷⁰

上述出土的明代文物，都是當時重要的國際海貿商品。其中生產於萬曆時期的克拉克瓷，尤能反映萬曆年間和平島為一國際海貿據點的事實。當時漢人是從事上述商口國際貿易的重要成員，其到雞籠(和平島)形成聚落並建廟供奉媽祖，祈求航海平安、交易順利，亦甚自然。故天啟 6 年(1626)西班牙人占領雞籠(和平島)時，即見到島上已有漢人聚落與市集。西班牙人占領雞籠(和平島)之後，漢人聚落依然存在，並未離開。據西班牙人描述，當時漢人聚落「巴利安」(Parian)就在西班牙人所建的薩爾瓦多堡的後面。⁷¹ 1930 年西班牙神父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e Maria Alvarez)曾推測該地，大約是漢人稱作 Sao-chun-tau 的地方。⁷² 而協助建築堡壘的也是漢人；這些漢人數量雖然不多，仍在島上開墾了田地。⁷³ 當時和平島的漢人聚落，約在薩爾瓦多堡後面的島上南側一帶，並已形成建築良好的市街，有各式商店和商人；此街當即是西班牙人所稱的「聖薩爾瓦多街」，也是漢人所稱的「福州街」。⁷⁴ 由此可見，西班牙人占領之前，雞籠漢人聚落已有商、農、工各種行業，反映其轉向定居性移民聚落發展的趨勢；且其後歷經西、荷和明鄭統治的考驗，島上人口或有榮枯，但漢人聚落生息於茲，不絕如縷，堪可視為清代以降漢人踵續移居的歷史奠基。⁷⁵

四、結語

根據中國史籍，早在三國時代的吳國和隋朝的煬帝時代，都有派兵征伐臺灣的記錄，但這兩次官方的行動，係出於執政者局部的軍政考量，屬於一次性個案活動；且當時中國人口沒有移出需求，既沒有官方後續發展的動機，也沒有誘發

⁷⁰ 鮑曉鷗、洪曉純主編，《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頁 244-261。

⁷¹ 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e Maria Alvarez)原著，李毓中、吳孟真譯著，《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頁 36-37。

⁷² 西班牙神父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e Maria Alvarez)於 1930 年推測：「這個地方，大約就是今日漢人稱作砂船頭(Sao-chun-tau)，在法國士兵公墓旁，現在日本人在雞籠的居住處。」見氏撰，前引書，頁 37。但他的推測自相矛盾，前說漢人聚落巴利安在島上薩爾瓦多堡後面，又說是在法國公墓旁，但法國公墓並不在和平島上。此外，Sao-chun-tau 似應為「哨船頭」，李毓中譯為「砂船頭」並加註說明是在大沙灣一帶，皆有待商榷。蓋現稱為「哨船頭」的地方係在「基隆市文化中心」一帶港區，離法國公墓有相當距離。唯按「哨船頭」意指清代哨船停泊的碼頭，清代和平島確有駐兵防守，或也有「哨船頭」，其位置可能在較近於法國公墓的方向，也就是現在連結八尺門兩岸渡船頭的地方，而且有可能在 1930 年漢人還稱此渡口一帶為「哨船頭」。

⁷³ 鮑曉鷗(Jose Eugenio Borao Mateo)原著，Nakao Eki 譯，《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臺北：南天書局，2008)，頁 191-193。

⁷⁴ 陳宗仁，前引書，頁 246-247。

⁷⁵ 有關西、荷、明鄭統治期間以及清代降至光復以後漢人賡續移居和平島的歷史變遷，乃至當代移民社群的類型特性，有待另外撰文加以探析。

民眾跨海航行的趨力，故不可能造成漢人移居臺灣的效應。唯隋代所留下跨海征伐的經驗，以及有關臺灣的「流求」記事，對後世勇於航海渡臺或跨越遠洋開展事業的官府或民眾，仍有重要啟發。

降至宋代，在東亞海域貿易旺盛的時代背景下，流求（臺灣）因位居連結東北亞和東南亞的航線指標，及其富有海貿轉運之利的條件，激發了漢人民眾主動出海的意志，並在「流求（臺灣）—三嶼（馬尼拉灣）—泉州（大陸東南）」的海貿網絡扮演重要角色。由於「土金」係其中重要商品，而使生產地的北臺灣和便於交易出口的和平島，成為此網絡的一環。唯和平島上雖有宋代漢人貿易的遺跡，但尚難確認曾有移居聚落出現。

元朝廷續宋代發展海洋活動的遺緒，沿海居民出海貿易、揚帆海外屢見不鮮；像汪大淵這樣來往南海諸國的商貿旅行家，不但曾親臨臺灣，甚至可能還登上了和平島。元人對臺灣的認知已遠過於宋代，已能掌握臺灣與福建、澎湖之間的天候地理條件與各線針路，漢人往來閩臺之間從事漁貿，也更頻繁。在出口商品中，沙金產於基隆附近山區，硫磺出自大屯山；進口商品中的「土珠/中國製玻璃珠」和「處州磁器/龍泉窯」都在和平島出土，反映當時當地進出口的暢旺以及漢人的活躍，甚至有季節性移居的可能。

明代初年「小琉球」、「小琉球頭」的地名，突顯了和平島在國際航道的重要性比過去更為明確；明中葉以降「雞籠」地名的出現，則更進一步伴隨著中國本身及國際商貿情勢的變化。一、就國內而言，明朝在隆慶年間解除海禁，萬曆初年更訂定船引制度，並將雞籠納入適用範圍，與浙閩粵同等待遇，鼓舞沿海居民拓展海上事業，吸引商漁船隻前來雞籠貿易營生。二、就國際而言，（一）明萬曆後期，倭寇跨國擾掠，驚動東亞海域，朝鮮、琉球、雞籠、閩浙俱為其目標，明朝因此而將雞籠納入閩浙海防範圍。（二）中國、日本、琉球之間的貿易需求旺盛，雖缺乏安全合理平衡的機制，仍吸引跨國海貿者投入其中，位於福建—琉球—日本航線要津的雞籠，吸引中日商人到此貿易。（三）西班牙、荷蘭在東亞競逐，並介入原有東亞海貿體系，也開始關注「雞籠」的價值，不但擴充了漢商在其間周旋取利的空間，也吸引更多漢人到雞籠交易營生。

綜上所述，在明末西班牙人占領雞籠之前，島上的漢人已從季節性移居逐漸轉向定居型態，乃為時勢所趨。今人論和平島歷史文化多以西班牙占領為起始，而不知此島原為巴賽人所居，更忽視宋元以降，漢人從較早的來此和巴賽人祖先相遇，經元代可能已有季節性移居，到明末轉向定居的長遠發展。面對當前和平島漢人文化的無所不在，有必要進一步追溯其源，召喚歷史記憶，以明瞭自古漢人來到和平島經營漁貿事業的歷程，及其背後寬闊深遠的跨海視野與人文底蘊。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an Immigrants in Keelung's Heping Island before Spanish Colony

Huang, Li-sheng*

Abstract

Heping Island locates in northeast of Keelung Port as its gateway. Heping Island locates in northeast of Keelung Port as its gateway. A millennium ago, Keelung (基隆, originally known as 'Jilong' [雞籠]) until 1875 AD) and Tamsui had already been crucial loc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ocean network before developing to be seaports. After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Jilong Mountain' with ancient name 'Small Ryukyu' had been a landmark of the 'Eastern Ocean Navigation Routes' that connected Japan, Ryukyu, Fujian and the Philippines archipelago before it attained the capacity of a seaport in the mid 16th century. The island was inhabited by Neolithic settlements 4500 - 3500 years ago. The originally settled people are Ketagalan Basai. Their ancestors immigrated to the northeastern shore of Taiwan from the Philippines about 2000 year ago and then moved to Heping Island. Han people moved onto the island sinc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ith the rise of maritime activities in East Asia.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migration pattern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seasonal to permanent ones. This place had already been a maritime trade stronghold for Chinese merchants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Spanish colony..By the late Ming period, the Han islanders survived the ruling of the Spanish, the Dutch and the Ming Zheng, laying foundation for the thriving of immigrant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immigration process of the Han people before Spanish Colony in order to examine and roots of folk cultural assets and the background of oceanic cultural network of Esat Asia on the Heping Island.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